

商南“县学”与青山书院

雷家炳

县学,系旧时供生员读书之所,是古代官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县学与孔庙合一,是各地县学的统一规制。其以儒家学说为国之正统教化之本,故亦称儒学、庙学或学官。县学是县级最高学府与教育机构,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方准入县学读书,应试者无论年龄大小,均称儒童、童生,习惯称为童生。童生经过“童试”取得入县学资格,谓之“进学”“入学”或“入泮”,士子称“庠生”“生员”,俗称“秀才”。明清时期县学生员分廪生、增生、附生三等。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岁贡在廪生中挑选,一般是挨次升贡,入国子监学习,通称为监生。监生在明清时期已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以通过科举做官。故此,秀才为功名的起点,县学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

商南的县学,系由首任知县郑瑛创建,地址位于今城关小学处,始于成化丁酉(1477)冬十月,迄工于乙亥(1479)秋八月,释菜礼即成(详见户部云南司政长安进士·萧谦撰《商南县创建庙学记》)。

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创辑之《商略·商南县集》载:“庙学在县治前,地广三十五丈,阔二十一丈。东南俱抵城,西北俱街民后墙,庙在前,学在后。”其主体建筑为:至圣殿5间,系奉祀至圣先师孔圣人的大殿;两旁配祀四配(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十哲(即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座龛。戟门3间,大成门3间,即文庙的最后一道朱红色大门,每组戟门按照皇宫制礼共有108颗门钉,以此表示孔庙建筑规制之高。东西庑共22间,系奉祀七十子及春秋以来先哲先贤诸儒牌位的殿堂。殿左神厨3间,系专为祭祀时制作祭品的厨房。殿右神库3间,为存放祭器、供品与请神送神的仪仗器具等物品的专库。启圣祠3间,位于大成殿正后方,为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之殿,配祀颜路、曾点、孔鲤、孟孙4氏;从食程颐、朱松、蔡元定3人。在戟门左西厢房3间、宰牲所3间,为宰杀用于祭祀的牛猪羊等牲畜的专设场所。在戟门右内厢房3间。棂星门3间,系位于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建筑。棂星又为天镇星、文曲星、魁星,象征着孔子可与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祭孔如同尊天。明伦堂3间,位于庙后,为学官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的场所。博文斋3间,为切磋学理经术的地方。约礼斋3间,为习礼的地方。敬一亭3间,在明伦堂后,系祭天的地方。学舍3间,号房(学生宿舍)25间。东西门楼两座,儒学门3间。教谕宅在明伦堂东,前厅3间,后房3间,左右厢房6间;训导宅在明伦堂西,前厅3间,后房3间,西厢房3间。射圃正厅3间,名曰“君子亭”,在东庑后署,为习射练武之场所。颁赐书籍:《五伦书》一部8本,《性礼书》一部共18本,《纲目》一部共20本,《近思录》一部3本,《朝祭服图》一本,《大札集仪并纂要》6本,《忠静官服图说》一本,《申说祀典》3本,《圣驾重幸大学录》10本,《汉唐品藻》一部6本,《小学集注》一部4本,《博物策汇》一部4本,《医方选要》一部10本。

明代县学的师资设教谕一名,训导一名。教谕(正八品)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既是县学的行政负责人,又是县学的首席教师,还与知县、县丞、典史一样属于政府官员。训导是教谕的助手,也是教官,起辅助教谕的作用,一般从举人或监生中选拔。明时,倡导“政教合一”与“官师一体”化制度,施政治理与敦勉教化并举,知县也多亲自到学讲授。

明代定制,县儒学名额为廪膳生20名,增生20名,附生16名,其中武童生8名。教学内容一般规定为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儒家经典。生员在县学学习期间,要参加岁考与科考。科考在每届乡试之前举行。这两种考试都由省级主管学官(明代为提学官,即按察御史或按察史;清代为学政)主持。明代规定科考一、二等的可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乡试,凡本省的监生与廪生、增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的,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逢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8月,分3场,考中者为举人,也叫孝廉,即取得了每3年在京城举行会试的资格。

商南庙学建立后,培养出了大批栋梁人才,自嘉靖庚子科(1540)李维祺首次中举后,人才辈出,仅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前取得功名,分别在外地州县任训导、教谕、主簿、照磨、吏目、县丞、知县的就近50多人(《商略商南县集》记载有名册)。

嘉靖辛亥(1551年),知县李渭渐又将庙学“易其旧而新之,至圣殿规模高大,雕刻玲珑,金碧辉煌,复之以绛幔,增之以铜鼎”,功大而制精,神悦而人欢。可惜崇祯六年(1633),商南庙学同城居一起在战乱中被焚毁,更加遗憾的是其间的学史资料被付之一炬而后世无存,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才移址于县治西(今县委大院)重新修建了文庙与儒学。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明令各省建书院,各县城皆始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亦相继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兴盛,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而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商南县于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将县衙西文庙学官正式更名为“青山书院”。“至商州延师训诸生,陈大中丞颁各种书籍,公余诣书院讲学,奉豫章书院学约”(民国志)。

道光十二年(1832),邑令胡大化在城内东南隅(现城关小学处)重建文昌宫,为九脊歇山式建筑,檐牙斗拱,朱柱画梁。有大殿3楹,高30米,宽20米,为2层楼阁式建筑;官后修正室3楹,厢房6间。遂移青山书院于此。光绪六年(1880)庚辰,县令樊继美就文昌宫楼下作“至公堂”,两旁建号房18间,重门3间,头门3间,围墙一周,号桌号凳俱完善,从此“书院”与“考院”合归于一处。

当时的青山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讲学事宜;教习(教师)分主讲、经长等职,多系聘请社会名流讲授,县令也兼讲课。如“文章冠绝一时”的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三角池河西的王肇基(字锡定)致仕后,县令王子陶慕其名,于光绪元年(1875)聘请其担任青山书院主讲数年。先后担任主讲的还有贡士出身、“品端学博”的富水潘友德,光绪乙酉科拔贡的湘河曹管青,咸丰年间贡生、“文章诗赋名于一时”的富水潘翊宸等。书院还设有“书斗”一人,具体办理考务;“首士”一人,负责管理学员生活。在书院学习的生员,一般是品学兼优的秀才,也有优异的童生,无严格定额,多则30余人,少则十几人。生员每月享有二三两膏银补贴不等,学习内容为四书、经史、八股文、五言八韵诗等,学习形式为平时自修课程,定期送交诗、词、赋、文章供批阅。每月定期开讲一次,每期考试两次,一次是由县令主持出题、阅卷、定等的“官课”考,一次为由山长主持出题、阅卷、定等的“师课”考试。学习年限以科举开考为限(3年),未中者允许再回书院补习,以待下科再试。

晚清时,朝廷在维新运动推动下,“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新式小学堂。商南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县令臧瑜委县城后营贡生赵士瑜,就青山书院考院改设“商南县小学堂”,就至公堂做讲堂,号房改为自习室,扩门外隙地作操场。宣统三年(1911),县令刘庚年因“学室简陋,不符定章”为由,设法筹款,委劝学所董路炳文(富水王家楼人,清廪贡生)、堂长赵士瑜以及孔庙祭祀官褚祖环(龙窝梅子沟人),就学校东旁建讲堂两座,号房18间,围墙一面,门户、窗棂一律遵新式学堂,规模焕然一新,更名为“商南县高等小学堂”,自此“青山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查考,曾担任过高等小学校长的有:曹宪章,字述先,湘河人,宣统元年由西安两级师范优级选科毕业;黄旭,字次焜,赵川人,毕业于西安两级师范完全科;文思安,字钦斋,青山人,民国元年毕业于陕西省高级警察学校。教职人员有:金正熙,字锦亭,湘河文化坪人,于民国七年由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完全科毕业;阮恩庆,字佐廷,县城人,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西安师范简易科;曹子俊,字心斋,民国元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完全科;周子谦,湘河魏家台人,陕西师范学校毕业。这些人都是当年青山书院的学生。

戊戌维新运动,在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民主思想的同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也一起输入中国,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社会改革的议事日程,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始兴。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当时举办女学成为地方政府的时髦之举,当作地方实行新政、立宪的主要政绩之一,因而客观上推动了各地女子教育的发展。商南县由中区长赵小亭首先于城区旧儒学明伦堂创办了“商南县女子私塾学堂”。1935年,县文教科长田紫荣与其协商,将女子私塾改为公办女子学校,招生对象由面向官绅子女为面向社

会,学生由自费改为公费,后于1941年并入了南街小学。后来,高等小学名称有过多次变更。民国元年(1912)改称“商南县高等小学校”,1923年改为“商南县高级小学校”,1933年又改称“商南县完全小学”,1935年10月,国民党别动队十九中队进驻商南县城期间,又改称作“商南县中山小学”,1945年改称“商南县层峰中心国民学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商南立初级中学始创于1941年。此前,各乡镇虽相继建起了中心小学,然而却无一所初中,家境富庶户子女小学毕业后尚能到商县、西安与河南开封深造,而贫寒子弟则升学无门。是年春,在县教育科长田紫荣倡导下,县政府召开各机关、乡镇长和各中心小学校长会议,作出了创建“商南立初级中学”的《决议》,组成商南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推选县长杜得霖、教育科长田紫荣、财务委员会主任邱仁荣(字耀庭)、北街女小校长文思安(字钦斋)、民教馆长余炳寰5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边向省教育厅报告,呈请批复立案、拨付开办费与补助款,一边积极筹措建校事宜。首先,将北街女校合并于南街小学,将文庙西侧女校作为新设的“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并将原女校校舍、桌凳、财产、器具与经费一律移交新设的初级中学接管。其次,领取省教育厅批拨的经费,购置图书仪器。再次,就是选定教师与进行暑假招生工作。当年秋正式开学,首次招三三制(系民国三十三年即公元1944年毕业班)初中生两个班,预录100人,实录为130人;除本县学生外,还有邻近的河南省淅川、西峡县与湖北省郧县、郧西县以及本省洛南县与丹凤的学生。校长由县长杜得霖兼任,教育科长田紫荣兼任教导主任。1942年由王统五任校长,1943年下半年后即由田紫荣担任校长。先后担任教导主任的有王统五、刘本先、余炳寰、吴明卿、冯勤先、邱庆勋、席炳南等,邱庆勋于1944年秋曾任代校长。

1944年,首届三三制甲乙两班初中毕业。奉省教育厅指令,又增设一个50人的国民教师师资训练班,由余炳寰任班主任,吸收本县在任的小学教师或具有同等学历人员学习培训,学期一年。

1945年春,日军攻占到河南西峡的八庙,商南已能听到炮声。危机之时,商南初中师生在时任代校长、教导主任邱庆勋与余炳寰带领下,于农历二月避迁至水沟张家祠堂,继而又辗转避迁到黑漆河方家湾,初中班驻方家祠堂,师训班驻刘家祠堂。7月间搭台演戏,欢送三四级初中生与师训班毕业。8月中旬,日寇投降后,初中遂迁回县城。当时驻东南的抗日第七后方医院撤销后,将县立初级中学迁至原第七后方医院址(即现高级中学处)。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又将原师训班改为“三年制简易师范”。至1948年,商南立初级中学共招收初中生8班,毕业5班;师训班一班,毕业41人;简师班3班。期间毕业和在校学生达600余人,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民教师和革命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位烟农的大爱情怀

晁光玲



孙钟亮接受洛南县电视台采访

小寒节气刚过,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远远望去,整个世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道路寂静,行人寥寥。

1月6日傍晚,洛南县永丰镇李村的孙钟亮家,新房敞亮,炉火暖和。“钟亮,你赶快换好棉袄穿好棉鞋去换班,让值白班的人早点回家,吃口热饭,多休息一会。”离换班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妻子就催促他尽早出门,去村口的疫情防控排查点值班。

2021年12月以来,我省西安、延安、咸阳、渭南等地接连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式十分严峻,各地陆续采取了防控措施,孙钟亮所在的李村也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排查点。

“自从21日村里成立排查点,我就报了名,来到点位,参与值守。”2021年12月31日,洛南电视台采访了孙钟亮,镜头里的他语言质朴、言辞恳切:“排查点搭了帐篷后,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是家里有的,我都带来了。为了洛南人民的平安,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大家一起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51岁的孙钟亮是李村的一名烟农,1996年开始

种烟,靠着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劳动,成了村里有名气的种烟“专家”,年均种植烤烟20多亩,收入9万元以上,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2021年12月,他们刚刚搬进300多平方米的新家。

“依靠种烟,我们全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买了车子,搬进了新房子,也有能力帮助他人了。”经济宽裕后,心地善良的孙钟亮经常帮助孤寡老人和家庭经济困难的乡亲,特别是2016年加入洛南县义工联合会后,不仅积极参加公益活动,还带动身边爱心人士一起做公益。2017年2月,孙钟亮被共青团洛南县委、洛南县义工联合会评为“最美义工”。

“原本打算搬了新家以后去西安做义工,结果没去成。”孙钟亮说,因为疫情防控要求,西安封城了,他无法去西安做义工了。这时候,村上刚好需要人帮忙。“我就决定在家门口做点实事,反正都是为抗疫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寒冬腊月,晚上值守,又冷又担心疫情,你不怕吗?”

“不怕,我做好了所有准备。在做好个人防护、穿暖

和的同时,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按照排班表准时值班,严格巡查。”孙钟亮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高速路围栏外对所辖区域路段和高速路沿线村居坡地地带严防死守,24小时不间断轮番巡查,一旦发现途经李村段高速路的违规车辆及下车人员,一律讲清政策、耐心劝返,坚决守好外防输入坚固防线。

实际上,孙钟亮并不是第一次参与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过春节时,孙钟亮曾瞒着家人,只身开车到武汉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出发前我准备了煤气灶、睡袋、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水、蔬菜等个人生活用品,还带了电锤、电钻、打磨机等工地上可能用到的工具,自购了40米线缆。”孙钟亮回忆。在施工现场,他听从指挥,搬东西、运沙子、搅拌水泥等,什么活儿都干。2月2日,火神山医院正式建成,孙钟亮于次日回到洛南,按规定完成了隔离。同年,孙钟亮收到两面锦旗,分别是“诚信烟农 最美义工”和“最美村民 抗疫英雄”。看到红红的锦旗,想起那段万众一心的岁月,孙钟亮觉得自己的付出很有意义。

在武汉时,孙钟亮认识了许多来自安徽、河南的义工,彼此成了好朋友,现在还一直有联系。“当时没条件看黄鹤楼和武大的樱花,以后有机会,一定再去武汉,好好走走看看。”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正是无数个像孙钟亮一样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志愿者,为抗击疫情贡献着个人的微薄力量,共同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谱写着一曲曲普通人的奉献之歌。

“2021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这个排查点共劝返违规车辆17辆,阻拦5人送到相关单位进行处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做好防疫相关工作!”

置身美丽的雪景之中,放眼望去,满山的树木刚劲挺拔,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陈毅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相信在疫情过后,我们都会变得更有力量,更加坚强。



孙钟亮(左一)和志愿者晚间在疫情防控排查点值守时,生火取暖



孙钟亮(穿荧光绿上衣者)和志愿者一起在疫情防控排查点值守